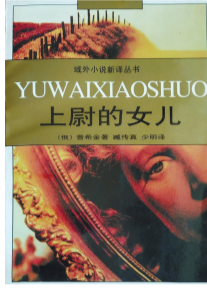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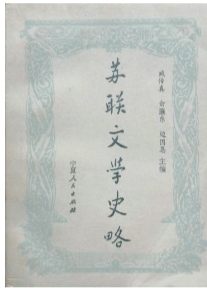




# 锲而不舍 译出风格

——记翻译家臧传真先生

谷羽



臧传真先生的著译代表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优秀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风格。当翻译家的风格与其选择的作家风格相近时,译作便会达到上乘水平,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译,像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都是译坛公认的典范。反之,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如果功底不深,修养不够,仓促上阵,选择不当,则很难保证译作的质量,更谈不上把握风格和译出风格了。

臧传真教授生前长期任教于南开大学,他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资深翻译家,对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参与主编过《苏联文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还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其译笔严谨、精确、简洁,向为学界推崇和称道。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中文译本即出自臧先生的译笔,该译著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多次再版,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说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臧先生最喜爱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和高尔基。除了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三幅画像》《春潮》《父与子》;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幸福》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俄罗斯作家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点,首先,语言风格极为相近,简洁、朴素、清新;其次,作品题材都贴近大自然;再有就是表现人生际遇富有人情味,充满人道主义的关切情怀。臧先生性情儒雅、文笔洗练,选择翻译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

后应出版社之邀,臧先生开始重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喜爱他的译著,把他的译作视为范本,常常对照原文阅读,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经常就某些疑难问题向先生讨教。这一次,我更有幸先睹为快,看他的手稿,聆听先生谈译书的体会,受益良多。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的译本将书名译为《猎人日记》,在我看来,“笔记”显然比“日记”更合适。但臧先生却想把书名译为《田猎随笔》,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他解释说:“打猎有两种方式,去深山老林打猎,称为行猎;在乡间树林和田野上打猎,叫作田猎。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以猎人身份出现,访问地主庄园和农家,了解乡情,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接近下层人民,因而译为《田猎随笔》更贴近作品内容,也更符合游记散文与小说故事两相糅合的叙事笔法。”想不到一个书名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遗憾的是,后来臧先生的译本出版,依然沿用了《猎人笔记》这一书名。

臧先生还把《白净草原》改译为《贝氏牧场》,我问有何依据。先生解释说:“Бежин луг,前一个词是由姓氏 Беж 构成的形容词,这个

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是德国人的姓氏,音译可译为‘贝日’或‘贝什’。后一个词的意思是‘草地’‘牧场’,并非‘草原’(степь),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可译为‘贝什家的牧场’,译成‘贝氏牧场’则更简练。1991年俄罗斯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编者称历史上确实有‘贝氏牧场’,贝氏家族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有关该牧场的文书。有关这一点,我特意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情况。”听了先生的一席话,顿生无限感慨。“白净草原”流传了几十年,没有译者 and 读者提出怀疑,只有遇到了学养有素、译风谨严的翻译家,才把误读误解的题目改正过来。由此我想,文学翻译绝非文字的简单转译,除了文字功底以外,还要求译者具备渊博的文化知识和一丝不苟的探索求真精神。

记得有一次聊天,谈及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臧先生对我说:“就一般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自由和公正这些人类社会基本精神法则的守护者。他们依据这些精神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努力促使这些精神能够得到以弘扬。屠格涅夫和其他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一样,摆脱了政治依附地位和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献身于更广大的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作家个性的成因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更主要的是源自其社会观念和理想。屠格涅夫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议,这和其创作个性以及独立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有关。”

另一次聊天中,我说屠格涅夫始终是小说家,但终其一生是诗人,为此我引用了罗亭的一段话:“诗歌——是神灵的语言。我自己就喜欢诗。不过,诗意不仅仅存在于诗行里;诗无处不在,诗洋溢在我们四周……您看看这些树,看看这天空——四面八方都吹拂着美和生命的气息,而什么地方有美和生命,那里就有诗。”

臧先生听了点点头:“你说得对。这段话虽出自罗亭之口,但的确是作家发自肺腑的

心声。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其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他的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抒情笔法和淡淡的忧伤。有人说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实,浪漫主义才更符合他的创作个性。在《猎人笔记》中,他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讴歌了生命之美。一篇篇野就是一簇簇花束,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带着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我发现,只要谈话涉及心爱的作家与作品,臧先生脸上就会焕发出光彩,侃侃而谈,兴致极高。他说:“你想想看,屠格涅夫笔下的动物形象该有多么鲜活!音容笑貌,呼之欲出!霍尔狡猾又精明强干;卡里内奇散漫随和,又富于艺术天性;民间歌手雅可夫的歌声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活力,让你赞叹;月夜牧场围着篝火讲鬼怪故事的农家孩子,让你难忘……这一个人物全都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也在世界文学宝库的人物画廊上留下了身影。”

当谈到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时,臧先生更是连声赞叹:“屠格涅夫写景的功力,不仅让托尔斯泰叹服,也让许多西欧作家推崇备至。《猎人笔记》中的风光描绘,真可谓出神入化!变幻的霞光、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斗,森林、草地、溪流,出没的野兽、唧唧的鸣禽、机灵的猎犬……在他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处处充满了色彩、音响,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他的听觉和嗅觉极其灵敏,目光又格外锐利,似乎大自然在晨昏之间、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化,他全都了然于心。他那支生花妙笔描绘大千世界的确达到了精致入微的地步!”臧先生的这一番论述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热爱,才能痴迷;只有痴迷,才能透过文字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并切身感受作品营造的氛围。

还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先生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译文学作品,最难的是译出风格。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必须反复通读原作,仔细揣摩人物情感、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只有吃透原作,才能

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情境、意蕴与格调。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的死译,忌讳‘字典搬家’。要知道,词在句子里是有生命的,词在字典里是死的。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反复琢磨,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增删词语,调整语序,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臧先生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作家讲故事,描写风景与环境,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贯穿始终,风格大体上一致,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另一种是人物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修养、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流畅、有的啰唆,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当雅则雅,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律追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翻译教材,有志于文学翻译者读了定会从中获益。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英语,于古汉语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样,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比如在书中遇到有关契约、文书、信函一类的文字,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文化色彩。我自己能读一点古文,却不会用古文写作,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惭愧。

还有一次,我和臧先生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译著具有“阶段性”。臧先生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个译本都具有首创性,是很难的,即便存在某些缺陷,但功不可没。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理应译得更好。臧先生说自己的译本也具有“阶段性”,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便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可以淡出或隐退了。臧先生的这番见解全然表现出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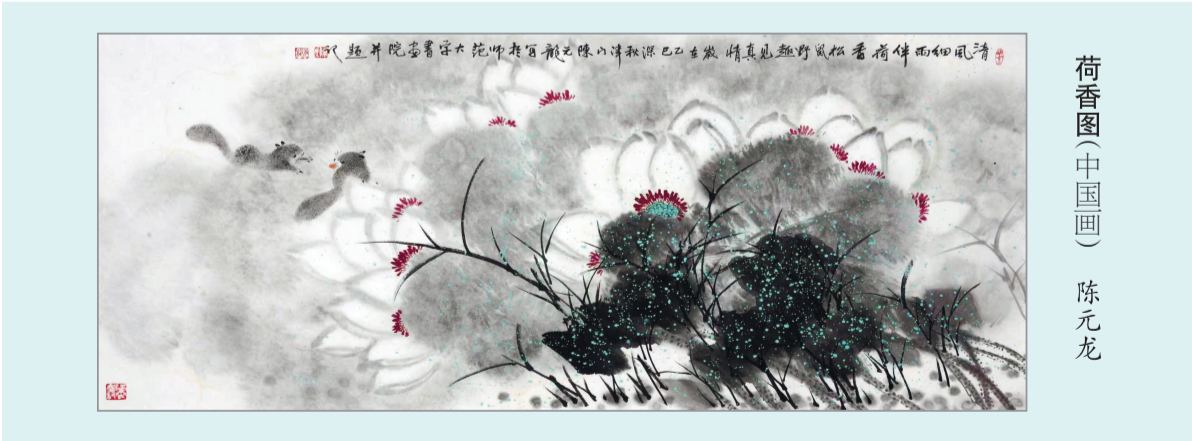
臧先生译过很多俄罗斯小说,却从未去过俄罗斯。对此,他深以为憾。他说:“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作品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我在读书时,常常神游俄罗斯,广袤的森林,茫茫的雪原,城市、乡村、教堂……种种景象呈现眼前,却都是书中得来的印象。有人说译文学作品最好能做到身临其境,看来我只能心临其境。这正所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臧先生为我们上课,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我们相互传阅他译的《盲音乐家》,大家都为有这样的名师授课而庆幸和自豪。我比同学们更加幸运的是留校当了教师,继续做臧先生的学生,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我出版了自己的译著。虽然臧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赠送的十多本译著现在依然排列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翻阅浏览那些珍贵的赠书,仿佛先生依然近在身旁。先生的教诲依然清晰可闻,我会沿着先生走过的道路继续默默地前行,不辜负先生的嘱托与期望。

(作者系翻译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学人小传

臧传真(1922—2017),河南省确山县人。194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1962年调入南开大学,任外文系副教授。1980年转至中文系,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生)导师、教授。南开大学翻译学科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主要译作有《盲音乐家》《高尔基文集》(合译)《三幅画像》《莫里哀传》《古希腊戏剧史》(合译)《幸福》《上尉的女儿》《春潮》《父与子》《猎人笔记》等;出版有《苏联文学史略》《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苏联文学史》等学术著作。



荷香图(中国画) 陈元龙

红楼微语(六)

## 史湘云的“咬舌”

魏暑临

痕迹,恐怕也是作者不经意间留下的,作者明显是要把所有人物的语言统一化的。湘云若有乡音,其他地方为何无体现?贾母是她姑祖母,怎么也无体现?

湘云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结合其年龄,我认为其咬舌是一种生理性语言发育不足。不少人幼时因舌部肌肉或神经发育等限制导致发音不清或错误。我曾见有的小孩发不出i音,说“写了”就是“写e”,且多数发e音时鼻音较重。1属舌尖中音,发音时舌头要翘起,这对一些小孩来说比较吃力。此类情况常随年龄的增长、发育的完善而自然消失。

把“二”读成“爱”或“厄”的方言,声音其实都比较硬,也许有人听来觉得可笑,但恐怕算不上“娇音”;湘云唯有是一种因年幼而说不清,带着一脸笨笨的、憨憨的感觉,才显得可爱,否则脂砚斋不会评为“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

还是要解决此问题:若湘云是娇憨地把“二”读成“爱”,那么她为何要扯出一个“厄”的音?原来,她的情况正类似于上文提到

张伯苓、王会共同创作的《渠阳乡情》诗配图长卷共四卷,长达60多米,从最初看到现在,一直让我感到震撼和亲切。我出生于宝坻,8岁时随父母搬到市里来了。看到这幅诗配图长卷的内容,感到他们画出、写出了我记忆中和思念的东西,画出、写出了包括宝坻父老乡亲在内的天津民众的珍贵记忆。所以这幅长卷不是一般的乡情展示,而是从历史维度、内容维度、从童趣到农事再到风土人情,直至文化等多方面描写乡情。其描写乡情的高度、深度、广度,给人印象深刻。它把我们往日失落的记忆和梦幻中的想象重新召唤回来了,这是非常切合时宜的创作。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长卷很多,但真正表现民俗的诗画长卷很少,张伯苓、王会创作的这幅长卷是颇有创意的佳作。这幅长卷巨制,堂庑宏阔,气势磅礴,就表现农村风俗来看,在天津画坛上是首次。我们从美术史上看到一些现象,比如有些本不是美术界的人士,由于多年艺术积累和感情修炼,第一次创作就能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看起来很例外,其实有必然性的因素。所以艺术创作最终还是创作者本身的修炼。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不是什么职业或职称,也不是什么样的身份,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修炼程度。创作者修炼程度够了,艺术创作自然成功了,这就是艺术的天籁。这种民族文化的天籁,也是时代之音。什么时代出现什么绘画,出现什么人物,这是艺术史的必然现象。所以我认为这幅诗配图长卷,无论从非遗的角度,还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突破,值得欣赏、品味和研究。

我从四个方面谈这幅长卷创作的价值。

第一方面是此幅长卷具有珍贵的认知价值。它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宝坻农民、农业、农村的真实情景,是两位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形象生动,内容真实,环境真实,情感真实,充满了大真气象。在艺术创作上达不到本质上大真境界,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情景是大真之境,在感情上是大爱之境。这不仅仅是爱自己,也不仅仅是爱一个地方,而是爱朴实的农民、朴实的农村。此幅诗配图长卷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诗词60多首,王会配画上百幅,内涵非常丰富,是对我们天津宝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情实景最可信的文学记录,非常具有当年天津地区农村风俗文化的特色,因此它能够保留,也能流传。所以这幅长卷不仅具有珍贵的认知价值,也具有其必然的历史价值。

第二方面是此幅长卷具有深刻的教育价值。长卷的内容充满了正能量,非常准确深入地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宝坻农村、农民的真实情景,反映了当时农民质朴、勤劳、乐观和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表现了当年天津农民主人翁的幸福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每首诗每幅画都体现出热爱家乡水土、热爱新中国的家国情怀。视野开阔,胸怀开阔,颇具时代风采。譬如“担水”诗写的是:“一条竹扁两只桶,日常生活亮彩虹。舞动乡愁云和月,走在村野天地中。吃苦受累寻常事,家国担当乐融融。”一位农村姑娘在田野间挑水,引出生活中的彩虹和家国担当,而且挑水时颤悠颤悠的竹扁担,能舞动乡野中的云和月,这是多么高雅的诗境,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时代风采。这种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情感都是从两位作者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对于观者的教育和感染是难以忘却的。

第三方面是此幅长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主创作者张伯苓对宝坻的人情世态、一草一木、乡村父老都有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感悟。画家王会在创作中也极为认真负责,每个人物的服装和表情,乃至具体场景的细节,都力求符合当年的真实情况,弄不清楚的地方就及时向前辈请教,决不图省事随便编造,更不能自欺欺人,而是从各方面达到历史事实的准确性,用自己的真才实学、真心实意,进行有深度、有高度和有温度的艺术创作。所以这幅长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地域特征,在描绘乡村童趣和农事的同时,也展现了宝坻的四季风光,如潮白河、箭杆河、窝头河、蓟运河等河流的美景,特别是表现农民的娱乐活动及过年过节欢乐心情的,让整幅长卷充满了热爱之情、浓郁乡情和审美意趣,非常具体、传神和生动。

另一方面,这幅长卷更为可贵之处,就是作者能够从中华文化的高度去表现昔日农村的风俗民情。值得一提的是,长卷中展现了四位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即浩然、董湘昆、马季和赵丽蓉,他们都是从宝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优秀儿女,是宝坻风土乡情培育出来的文化人物。这幅长卷印证了宝坻风土的地灵人杰,也印证了我们津派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巨大的潜能。

(张伯苓主创、王会配画《渠阳乡情》诗配图长卷近日已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 满庭芳

第五四一五期

## 天心阁

刘松林



天心阁离我家不远,年少时不知道天心是什么意思,认为天心就是天的心脏,走到近处便能听到天老爷心跳的声音。稍后更事,朦胧天,父亲带我登天心阁。天心阁亦称天心公园,有数百年历史,为长沙城最高处。城墙,斑驳苍颜,石上苔青。仁立城头,伸手可以触云,父亲笑呵呵说“手触之处就是天心”,笑声牵着云彩飘进了我的心里。

一晃数十年。今年深秋,独自又上天心阁,城阁高处是崇烈塔,崇烈门,经风历雨,沧桑厚重。包括崇烈塔和崇烈门在内的天心阁抗战纪念设施,是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之一。崇烈门是一座牌坊式建筑,始建于1946年,是为纪念抗战时期长沙三次会战中阵亡的将士而修建。崇烈塔同样始建于1946年,塔基为六边形,塔身由圆盘和圆柱构成,圆柱顶端昂首屹立一石狮,石狮明眸远眺,仰天长啸,昭示疆土神圣,不可侵犯。

园中树木愈加高密,有槐,有松,有梧桐,我最爱的依旧是红花榿木。红花榿木为天心阁植物之骨骨,其发现及命名均在天心阁,它是抗战初期林学家叶培忠从天心阁城墙裂隙中捕获的中国原生美学一抔最暴烈的红。天心阁现存3棵野生红花榿木,有160多年的树龄。如此树龄的红花榿木全球仅存8棵,天心阁得3棵,实属不易。

春秋两季是红花榿木之花绽放时节,花朵肆意张扬,灵动闪烁,宛如霞光四溢的锦绣,又似烟波浩渺的意象。落花时,身碎黄尘,燕然勒功,热血殷红。

十月的花,如血流淌似火燎原,连绵延续到崇烈塔下,血色裹着火焰攀缘台阶,朝崇烈门一路狂奔,雄浑热烈。

染一身热烈站在天心之处,望城郭,远处,麓山深厚沉甸,苍茫囊括,荫护无量壮烈少年,他们英勇,他们年轻——他们拥有不尽未来的年纪。英雄无限,山河无恙。



洁上丛话